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百三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名人自述

耄年回忆	张岱年(1)
------------	----------

外交史话

50 年代前期中捷友好关系的若干回忆	李清泉(39)
瑞士七年	李清泉(61)
一次神秘的外交使命	
——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	唐龙彬(75)
一次震撼世界的外交壮举	
——接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	
.....	唐龙彬(85)

航天春秋

第一种国产导弹的诞生	林 爽(96)
远程火箭研制片断	梁思礼(104)
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	张贵田(111)

往事追怀

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	贾亦斌(119)
-------------------	----------

珍藏文物历难记 吴 徕(166)

人物述林

忆人民教育家俞庆棠..... 秦柳方(181)

中国近代化学制药业的开拓者赵汝调

..... 钱椿涛 钱昕涛(188)

记祖父李根源抗战初期新疆之行 李成缙(205)

名人自述

耄年回忆

张岱年

张岱年，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1935—1936年著成《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国近代第一本系统论述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曾任私立中国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还有《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科学》、《文化与哲学》等。

我的家庭和幼年时期

我生于1909年5月23日（夏历四月初五日），当时父母住在北京。据一个同族的长辈对我说，当时你们家住在北京西城酒醋局。到三岁时，母亲带着子女回乡居住，我幼年是在乡间度过的，原籍河北省献县。我家所在的村庄名叫小垛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到50年代，这个村庄划归沧县，我的籍贯改为沧县了。

我父亲名濂，字中卿，一字众清，生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母亲赵太夫人，生于1869年（同治八年）。我们家历代在农村生活，到我祖父时渐至饶裕，成为中小地主。祖父有子七人，我父行六。祖父读书而未应科举，四伯父张润应举中拔萃科，是为张氏应举的开始。众清公于1905年（光绪二十九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入进士馆肄习法政，1907年授职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以后，1918年（民国7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曾任沙河

县知事及枣强县知事。晚年在北京闲居，任燕冀中学的校董。晚年喜“黄老之学”，以为黄帝老子高于儒家，研究《黄帝内经》与《黄庭经》。喜书法，崇尚颜体，所写的字刚劲凝重，尝印一印章云“留心翰墨近四十年”。又认为在五伦之外尚有一伦，即没有朋友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称之为“人”伦。因而自号六伦。晚年在京经常来往的朋友有尚节之（秉和）先生、陈紫纶（云诒）先生、刘润琴（春霖）先生等。

母亲是河北省交河县赵家庄人，勤俭持家，待人慈和宽厚。民国初年即回乡居住，主持家务。母亲生四子二女，劬劳实甚。我的长兄名崧年，字申甫，一字申府；大姊张敬，二姊张敏，二兄崇年，我行三，还有一个四弟。约在1918年（民国7年）秋天，东邻二伯父家的场院中柴堆失火，我家场院距离很近，母亲指挥长工赶快搬移我家的柴堆，幸而没有烧着。但是母亲由于高度紧张，惊慌太甚，第二天遂患半身不遂。我的四弟很伶俐，胆大活泼，一天独自到村边一个池塘洗澡，竟至溺死，没有抢救过来。当时吾母卧病在床，遭此惨痛，遂于次年（1920年）4月5日逝世，寿仅52岁。吾母病时，全赖二姊服侍，请过几次中医，都不见效。当时我年幼无知，未能帮助服侍，思之甚愧！

我三岁时随母回乡，过田园生活，五六岁时进村中族人办的学塾，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之后，父亲为二兄和我延请一个表兄卢先生教我们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只是背诵，并不讲解，也教我们看新式小学课本。当时念的书不多。有一次到村中学塾中听一位杜先生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听来很感兴趣，也能大致听懂，但没有继续读《左传》。

母亲病逝时，父亲和大兄申府都不在乡中，他们都在北京，闻讯归来，办理丧事。1920年（民国9年）夏初，办完母亲丧事，父亲带领全家离开家乡，到北京居住。当时父亲任众议院议员，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半壁街16号。父亲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始终未买房子，仅租房居住。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属于中下等类，每

月租钱银元 30 元。到这年秋天，由大兄申府安排，叫二兄和我到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学习。二兄上高小三年级，我上高小一年级。初入学时赶不上，家里又为我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很快就赶上了。三年之后，小学毕业，毕业考试名列第四。当时北师大附小的主任是张铎民（安国）先生，毕业后还有联系，但几年以后他就去世了。（北师大附小在解放后改称宏庙小学。）

当时长兄申府已经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工作，正在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在学术界因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他白天都不在家，早出晚归。他在外面的活动也从不告诉家里人，我们只知他很忙。不久他就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去了，几年后才回国。

我和二兄崇年经常在一起。母亲在世时，常对二兄和我说：“你们要努力向上，做个好人。”我们遵循母亲的遗教，努力读书学习，从不沾染社会上的各种恶习，对于世俗的娱乐如听戏打牌等亦无所好。父亲不过问我们的学业，偶尔加以勉励。在所住四合院中，我住南屋，父亲为南屋写一副对联云：“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这寓有勉励之意。父亲在住宅大门贴一副对联云：“大林容豹隐，原野听龙吟”，表现了自己过隐居生活的态度。

在京求学

1923 年（民国 12 年）暑期，我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试验班，入学即上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1926 年初中毕业；1927 年春考入高中班。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附中主任（实即校长）林励儒先生为全校作了一次学术讲演，讲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林先生强调这是康德的大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听了非常感动，非常钦佩，从此“要把每个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工具”这一道德律令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之中。

当时国难深重，每年5月7日定为国耻节，举行纪念活动。当时我也看了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书籍，知道中国人民的任务，一是外抗强权，争取民族独立；二是改造社会，革新政制。初中毕业时，班主任卢玉温（光润）先生让每个学生写终生志愿，我写道：“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今日看来很可笑，表现了当时狂放和幼稚。中年以后，自知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了，但是报国之志是始终不渝的。

初中二年级之时，同学庄镇基喜谈老庄哲学，于是引起我对于哲学的兴趣。我初读《老子》，如入五里雾中，感到莫明其妙。后来读了一本《新解老》，其中认为老子所谓道即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原理，于是忽有所悟，对于老子学说有所理解。又读了《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对于哲学有所领会。

当时对于哲学有所了解之后，于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常常独自沉思：思天地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归趋。每天晚上经常沉思一两小时，养成致思的习惯。

高中一年级时，班主任汪伯烈（震）先生开了“中国哲学史”课程，我很感兴趣。汪师兼通文学、哲学、心理学，对于美国詹姆士哲学有较多的研究，常和我们谈论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汪师在一份题为《认识周报》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当时中国哲学界的文章，评述了胡适、梁漱溟、朱谦之、张崧年等的思想，说张崧年是中国新实在论的代表。这时我才稍知长兄申府与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关系。当时我在“作文”课中写了一篇题为《评韩》的文章，内容批评韩非反对道德教化专重刑赏的观点。汪师甚为欣赏，在课堂上对全班同学说：张岱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论文也不过如此。对于汪师的赞赏，我衷心感激。汪师将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师大附中》月刊上，现在已遗失不存了。

在中学读书时，国文教师和学生接触较多，因而印象较深。国文老师，汪伯烈先生之外，还有张少元（鸿来）、张建侯、董鲁安、

卢伯玮、夏宇众诸先生。其中汪伯烈先生、卢伯玮先生对于我都很器重，也有一位数学老师丁文渊先生，师生情谊较深。我读初中时数学课成绩较好，丁师再三劝我研究数学，可惜我的兴趣后来转向哲学史方面了。

在高中读书时，我写了一篇考证列子的文章，题为《关于列子》，内容是证明列子实有其人，反驳列御寇系子虚乌有之说。投寄《北京晨报》，于1928年3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这是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得稿费银元8元，当时甚为欣喜。

1928年暑假，我报考清华大学，被录取了。开学之后，添设了军事训练，由两个国民党军官任教官。我不愿受国民党的军事训练，退学了。适逢北京师范大学招生，遂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也录取了。当时本拟报考北京大学，那年北大招生较晚，因已被师大录取，就到师大入学了。原师大附中的同班同学阮庆荪、庄镇基、陈伯欧、陶雄、谷万川等也都考入师大，老同学又聚在一起了。由谷万川介绍，认识了王重民；由王重民介绍认识了孙楷第、刘汝霖。当时王重民、孙楷第等组织了一个努力学社，出版了一期《努力学报》，邀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题为《古书疑义举例再补》，是一篇考证文章。

当时阮庆荪、陈伯欧、谷万川等又组织了一个“人间社”，是一个研究文学的学社，在此社中认识了潘炳皋。人间社有时请学者来校讲演，有一次请大兄申府来讲了一次，题为“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颇受同学们欢迎。申府后来在师大开“现代哲学”课程，讲新实在论哲学，历史系的张恒寿也来听讲，于是彼此结识，成为莫逆之交。

教育系的同班同学傅继良建议合译一本书，于是选择了杜威的一本小册《教育科学的源泉》，由同学高元白协助出版。傅继良还想再合译别的书，但我的兴趣转向中国哲学史，不想译书了。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采用学分制，不计年龄，学分够了可以毕业。许多学生由于生计困难往往中途到一些中小学任教代课，然

后再回到师大受学，学分够了才毕业。我在师大读书时，深喜自学，读西方哲学名著，不爱听课，因而过了四年而学分不足，又补了一年学分，于1933年毕业。我写的毕业论文是《怀悌黑的教育哲学》，导师是邱椿先生。由傅继良协助，此文在《师大学报》上发表了。

30年代至40年代的探索

1931年至1933年，我虽在师大听课，而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一方面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一方面研究西方哲学。也阅读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如梁任公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很感兴趣，但不满足。1931年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考辨之精，论证之细，使我深深敬佩！我本来对于老子年代问题有兴趣，在冯著上卷的影响之下，写了一篇《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大公报·文学副刊》，承编者嘉许，发表出来。此文认为《老子》书当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颇得罗根泽先生同意，后被编入《古史辨》第四册中。

关于西方哲学，在吾兄申府的引导之下，读了一些英文哲学著作。最喜读罗素（B. Russell）、穆尔（C. E. Moore-译摩尔）、怀特海（A. N. Whitehead）、博若德（C. D. Broad）的书。对于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译籍受到青年人的欢迎。我读了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译本，虽然译笔不甚明畅，但能窥见大意（40年代才读到这些著作的英译本）。我衷心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我以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尼采超人哲学作了比较，认为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

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我认为，辩证唯物论在认识论上解决了西方近代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既承认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又肯定理性的重要作用，理性认识以感觉经验为基础而又高于感觉经验；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既肯定物质是本原的，又承认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哲学。

1932年，吾兄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使我有机会发表一些长短不同的学术文章，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是为我参加学术论坛之始。当时写文，多署名张季同（因为我赞佩“大同”理想，故署名季同）。

由吾兄申府介绍，认识了哲学界前辈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熊先生看到我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的文章，对吾兄说：我想和您弟弟谈谈。于是我访问了熊先生，熊先生赠我他的著作《新唯识论》与《破破新唯识论》，我向他请教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我不赞同他的“唯心唯识”观点，但钦佩他的独创精神。我访问金先生，金先生说：“你写的《问题》一篇分析得很好，分析这条路子是哲学的一条可行的路子。”我访问冯先生，谈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彼此见解相近。

1933年夏，在师范大学毕业了。因为当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于是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这是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推荐，梅贻琦校长批准的。秋季开学，让我讲授“哲学概论”。吾兄申府决定，让我用美国D. S. Robinson的“An Introduction to Liring Philosophy”作为课本。我讲课时，增加了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学的材料，并且较详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哲学，并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

在清华大学任教，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是与张荫麟先生定交。荫麟字素痴，对于哲学、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造诣，他赴美到斯坦福大学留学，1933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专任讲师（即副教授）。他虚怀若谷，看到我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的

文章，表示赞同，遂成挚友。他时相过访，议论相近。后来到抗战时期，荫麟先生不幸在南方逝世，年寿不永，实为学术界一大损失。

我到清华任助教之次年，不幸遭遇大故，父亲患病不愈，于1934年（民国23年）3月4日（夏历正月十九日）逝世，家里一阵慌乱。父亲逝世后，大家庭解散，大兄、二兄和我分居了。

我30年代所写文章，可分为四类，一是关于中西哲学史的论述；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三是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分析；四是对于文化问题的见解。今略述其要点。

关于中西哲学史，我写过《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纪念斯辟诺莎诞生三百年》、《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中国知论大要》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关于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的两篇。以前讲中国哲学的很少谈到辩证法，有的也只是谈到老子，对于中国哲学中老子以外的丰富的辩证思维，很少涉及。我着重论述了老子、《易传》、杨雄、张载、王夫之的辩证观点，但讲得也不完备，没有讲孔子及朱熹的辩证思想。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写了《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其中《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依据自己的心得对于辩证唯物论哲学作了简要的评述，也有不尽恰当之处。《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展示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科学体系，意在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仅具有深湛的观点，而且具有一个缜密完整的系统。《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阐述。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没有关于伦理道德的专门著作，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含有非常深刻的关于伦理道德的理论观点，因而试图加以阐释。但当时尚未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故此文所讲是很不完备的。

30年代所写，比较重要的，是几篇提出个人哲学观点的文章。

1933年，我写了《论外界的实在》，意在从理论上证明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反驳主观唯心论。我认为，外界实在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决非无意义的，固然可以由实践加以证明，但是，如其是真理，必然也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证明。此文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时，吾兄加了“编者特记”云：“季同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对于吾兄的勉励，我非常感激！

1931年冯友兰先生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了几篇《新对话》，主张共相实在之说，提出“未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的著名观点。张荫麟先生著文进行争辩，认为共相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于是引起了我对于共相问题的兴趣。我联系中国古代哲学，写了《谭理》一文。文章一方面反对唯心论者认为事物规律只是人心所赋予的主观论，一方面也反对唯理论者认为在事物的具体世界之外还有理的共相世界的共相潜在论，也不同意实证论者的唯名论，而肯定共相的客观性。这是我30年代以来的一贯见解。

30年代以来，我一直关心中国哲学的前途问题，考虑中国哲学复兴的道路。1934年所写的《中国思想源流》的结语说：“西洋思想之输入，当是对于中国的思想力复活之刺激。中国的创造思想无疑地要复活……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取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哲学若还不能独立，别的独立更谈不到。中国要再度发挥其宏大、刚毅的创造力量。”这是我的向往。

1935年我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提出了我对于未来中国哲学的见解。我认为，中国现在所需

要的哲学，最少须满足如下的四个条件：（1）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方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2）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3）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4）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方哲学系统下的一分子，都是不能适应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克服之，同时对于西方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20 世纪初年，英国哲学家 C. D. Broad 分哲学为两种，一为玄想哲学 (Speculative philosophy)，二为批评哲学 (Critical philosophy)。所谓批评的即分析的之义。Broad 与 Russell 都强调逻辑分析方法，其所谓逻辑指形式逻辑。30 年代，中国学术界曾出现所谓辩证法论战，主张形式逻辑的反对辩证法，认为辩证法是诡辩；而主张辩证法的反对形式逻辑，认为形式逻辑是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没有价值的。吾兄申府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都是必要的，二者并无矛盾，而相辅相成，认为应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我同意申府此说。

30 年代，有不少学者试图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如熊十力先生讲“新唯识论”，冯友兰先生写《新对话》，金岳霖先生讲“道、式、能”。这也引起了我的理论兴趣，于是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试图提出自己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观点。我认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文章赞扬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而主张“以唯物为基础而吸取解析方法以及关于人生理想的深邃思想”。

所谓“将唯物、理想与解析综合于一”，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综合，一方面在方法论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另一方面将现代唯物论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

起来。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个唯物论传统和辩证思维的传统，更有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应该认真加以考察。

1936年，友人孙道昇发表了《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评述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的学术思想，以张申府、张季同为解析的唯物论的代表。当时我发表文章，多以季同署名。孙道昇是清华哲学系毕业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学生。

1936年我将历年致思的札记编成《潜思录》，亦题为《人与世界》，其中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要观点是：存在即是历程，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流，宇宙一本而多级，物质是一本，物质、生命、心知共为三级。人生之道是克服生命与生命的矛盾冲突以达到生命与生命的和谐。

1936年，冯友兰先生、汤用彤先生、金岳霖先生等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国哲学会”，召开了中国哲学会的第一次讨论会。冯友兰先生鼓励我提交一篇论文，于是我写了《生活理想的四原则》一文。提出关于人生理想的四个基本观点：（1）理生合一，（2）与群为一，（3）义命合一，（4）动的天人合一。

文章以“理与生”概括“义利”问题与“理欲”问题，对于宋儒所讲“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作了一定的矫正。文章在内容上提出了一些较新的观点，但写得很不通俗，而且采用了一些古旧的术语，四项观点之中三项用合一来表示，令人费解。因此此文发表之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30年代，除了上述较长的论文之外，还写了一些论述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方法的短文，如《辩证法与生活》、《辩证法的一贯》、《相反与矛盾》、《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逻辑解析》等等，都发表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此外还写过评介维也纳学派的文章《维也纳派的物理主义》，我曾经对于维也纳派感兴趣，认为维也纳学派对于传统哲学的批评确有可取之处。但是维也纳派认为哲学只能是对科学命题的分析，表现了哲学消灭论的倾向，这是我不能同意的。因此，我赞同罗素与穆尔的逻辑分析方

法，而对于维也纳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学说则不以为然。

30年代，文化问题曾引起热烈的讨论。胡适先生提倡“全盘西化”，梁漱溟先生则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当时我对于文化问题也很感兴趣。于1933年写了一篇《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点。我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入衰落之途。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获得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也有被征服被消灭的危险。近代中国遇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而国内有人提倡全盘欧化，显然是有害的。现在要仍旧保持传统文化，那是不可能的，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也到将被否定的日子，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要到来。中国必将产生新文化而成为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如果守旧不改，则无异于等着毁灭；如果妄自菲薄，以为自不如人，则难免有被外来侵略者征服的危险。中国旧文化的改造，同时就是新文化的创成，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文章强调必须用辩证方法来分析文化。这是我的一贯观点。

1935年我又写了《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两篇。这两篇都是反对“全盘西化”，而主张创造新的中国文化。

1935年至1936年，我集中精力专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写成50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副题为“中国哲学问题史”。这是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主要是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哲学理论问题选出，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宇宙论；第二部分人生论；第三部分致知论。此书力图展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问题、争论作出比较全面的阐述。对于传统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的内涵与歧义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分析，这可以说是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又对于概念范畴的发展演

变以及各学派之间的相反相成、交光互映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全书在主观愿望上力图做到较深、较准、较全。但是事实上此书没有能做到全面的阐述，最显著的缺点是在宇宙论篇中没有把“形神”作为专题来讲，在致知论中没有把“知行”作为专题来讲，这都是重大的缺漏。

现在应略述我 30 年代的生活情况。1933 年秋我受聘到清华大学任哲学系助教。1934 年 3 月，先父不幸逝世，办完丧事之后，兄弟三人分家，离开了居住十几年的南半壁街旧居。我因父丧忧伤影响健康，于暑假辞去清华教职，进城暂住北京图书馆宿舍，张荫麟曾来访谈，令我感动。友人张恒寿、潘炳皋亦常来共谈。当父亲在世时，由冯友兰先生及吾兄申府介绍，认识了冯让兰同志，让兰于 193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两年后回京，1935 年与让兰在北京结婚，租房住在辟才胡同二条 2 号。此房有三间宽大的北屋，《中国哲学大纲》即在北屋书房中写成的。1936 年，由冯友兰先生联系，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仍任助教，讲授“哲学概论”与“中国哲学问题”两门课程。“中国哲学问题”课即以《中国哲学大纲》为讲授内容。在清华与张荫麟先生常相过从。1937 年“七七”事变，时局紧张。7 月 29 日，日本侵略军入侵北平，清华同仁纷纷离校，我与让兰暂到城内大姊家居住，遂与学校领导失去联系。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助教，在我之外，还有李戏鱼、王森；哲学系助理是申荆吴，都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城内。8 月初又到校内搬东西，申荆吴帮助较多。我在北平多次迁居，有两年住在地安门附近东煤厂，之后迁至南长街二条，1941 年迁居西城小沙果胡同 8 号。当时闭户读书，不与敌伪合作，经常往来的朋友有王森、李戏鱼、张恒寿、常风、关其桐、王锦第、韩镜清、翁独健、成庆华、李相显等。当时在北平居住的前辈学者有陈垣、王桐龄、尚秉和、邓以蛰、张子高、张东荪等，亦皆闭户深居，不与敌伪来往。当时抗击日本侵略军，战争十分激烈，而我们未能参加战斗，只是潜伏敌后，等

待胜利，至今思之，还是深感惭愧的。清华南迁，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等随校南行，辗转到达昆明。张荫麟亦离京南行，其后不幸早逝。张申府南行经武汉到重庆，参加救亡、民主活动，于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

1941年冬天，我迁居西城小沙果胡同8号，住房是一座小楼，在楼上便于沉思，于是于次年春季开始写《哲学思维论》。当时太平洋战争开始，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有望，以满怀希望的心情撰写论著。原来的计划是将历年致思所得整理成为一书，题为“天人新论”，计划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方法论，第二部分是知论，第三部分天论，第四部分人论。后来未能完成原来的计划。方法论也写得较简，改题为《哲学思维论》。知论原拟写两篇，一为“知觉与外界”，二为“经验与理性”，仅写出“知觉与外界”，改题为《知实论》。天论亦拟分两篇，一为“事理论”，二为“心物论”，仅写出《事理论》。人论部分只写出简单的提纲，改题为《品德论》。这些论稿，《哲学思维论》、《知实论》写于1942年；《事理论》写于1943年；《品德论》写于1944年。其后生活日趋艰窘，就无力写作了。

我撰写这些论稿，意在实现“将唯物、解析、思想综合于一”的构想。《哲学思维论》提出了自己对于哲学的本质的观点与关于演绎法、归纳法与辩证法三者的关系的见解；《知实论》进一步论证外在世界的实在；《事理论》研讨事物与共相的关系问题，较详地论证了理在事中的唯物观点；《品德论》提出了一个以刚健而和谐为主旨的人生理想。这些论稿写作于抗战时期，不可能随时发表，胜利后又因故拖延下来，直至1988年，连同历年的思想札记，以《真与善的探索》为题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已在写成之后40多年了。但与王船山著作100多年以后才能刊布比还算幸运的。

回忆30年代初期，读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40年代之初，读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与金岳霖先生的《论道》，深佩诸